

【比较研究】

人际信任的南北差异与跨区域
经历的影响

白丽英 白世龙 黄诗琦 张艺瑶

【摘要】跨文化对比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差异,会影响包括人际信任在内的诸多心理因素。我国因地理文化等原因形成的南北差异,是否也会导致人际信任水平的不同,现有研究暂无定论。研究一依据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 Wave7(2018)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南方人对于陌生人的信任显著高于北方人;研究二采用微观调查进一步探索了跨区域(南北)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有跨区域经历者对同地区来源个体的信任,显著高于无跨区域经历者,具有类似“他乡遇故知”的效应;有跨区域经历者对陌生人的信任,呈现“入乡随俗”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人际信任;南北差异;跨区域经历

【作者简介】白丽英,河北邯郸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E-mail:bxuer@fzu.edu.cn(福建福州 350108);白世龙,河南驻马店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1286951281@qq.com(福建福州 350108);黄诗琦,福建厦门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212920017@fzu.edu.cn(福建福州 350108);张艺瑶,福建泉州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E-mail:774234451@qq.com(福建福州 350108),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23~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而不同视角下跨文化经历对普遍信任的影响研究”(21BSH096)。

一、问题提出

古语有云:“以信接人,天下信之。”(晋·杨泉《物理论》)信任是人际交往中维系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石,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人际信任作为信任的重要分支,近年来一直是多个学科的研究热点。^①社会生态理论认为,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会影响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系,进而作用于人们的心理过程^②,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并发现了人际信任的文化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以东亚地区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对内群体成员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对超出信任半径的陌生人信

任水平较低;在以欧美地区为代表的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均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③以往的研究习惯根据国家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划分,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和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式提出质疑,因为不同国家之间地理文化因素也可能相似,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也可能存在差异。^④在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生态环境多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南北区域划分格局。在不同文化影响下,我国南北方居民的人际信任是否也会出现区域性的差异?这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目前的研究

暂无明确的结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因此,赵娜等研究者提出,跨文化研究不应仅停留在比较差异的阶段,而应进一步探究文化环境的改变对个体心理、行为等因素的影响。^⑤

本研究拟从南北差异视角考察人际信任的差异,加深大众对中国文化细微差别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跨区域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揭示我国跨南北流动背景下人际信任的微观变化。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人际信任是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区别于制度信任的关系信任,是对交往对象履行所托的预期及信念^⑥,并可以根据信任对象的不同进一步划分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其中特殊信任的对象是与自己有特定社会联系的内群体成员,如亲人、朋友;一般信任的对象则是与自己没有特定联系的外群体成员,如陌生人。^⑦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得到跨文化领域的广泛关注。研究者常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倾向角度来解释信任的国家或地区差异(个体主义是一种关注自我的文化和价值观;集体主义则是一种关注集体,希望更好与他人相处的文化和价值观^⑧)。相关研究表明:个人主义文化倾向越高的地区,其居民对一般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因为对个人而言,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独立的个体;集体主义文化倾向越高的地区,个体更期望与内群体的成员保持良好关系,对外群体成员会有更多的戒备,因此对一般他人的信任程度更低。^⑨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然而这一笼统的划分忽略了内部的差异性。我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之间地理环境、文化习俗都不尽相同,企图用一种文化倾向囊括所有区域显然不现实。南北差异作为我国最明显的区域划分格局,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发现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存在显著的南北

差异,但现有研究的结论并不统一,存在以“水稻理论”和“气候-经济理论”为代表的两种对立观点。“水稻理论”认为,自古以来,南方民众主要种植水稻,需要集体劳作和人工灌溉,因而人们需要相互依赖与合作;北方民众种植小麦的劳作量小且彼此独立,因此相较于北方,南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水平更高。^⑩“气候-经济理论”认为,在气候更恶劣且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会增加彼此合作以获取资源,更容易形成集体主义文化。相比于南方,北方地区气候适宜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更倾向于集体主义。^⑪然而,“水稻理论”自提出以来就饱受争议,其一,他们所用的测量任务较为单一,缺乏更为严格的行为实验和神经科学的证据^⑫;其二,该理论认为,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北方人文化更偏向于西方的个体主义,实际上北方人仍然以整体思维为主^⑬。因此,本研究倾向“气候-经济理论”的观点,认为经济更为发达、气候更加适宜的南方集体主义文化水平更低,对陌生人的信任更高。

有学者发现,环境的改变会进一步导致个体心理和行为的改变。例如,Dinesen等人对来自90多个国家的移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证明了人际信任水平会受到新环境的影响而变化。^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⑮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显示,我国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69.73%。这些流动涉及四面八方,但是诸如省内、邻近地区的流动,由于涉及地区风土人情大多相似,各方面的变化相对较小。相较而言,跨南北方的个体由于经历了生态、文化等宏观环境的变化,接触不同的人文习俗,体验到的信任差异更为明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跨区域经历会对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先从我国南北地区的文化差异视角入手,从宏观层面,依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数据,探究人际信任是否存在南北差异;再通过微观数据调查,进一步探索在南北区域视角下,跨区域经历对个体人际信任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

研究一:基于 WVS 数据的南北人际信任差异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我国的南北方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在此背景下,南北方的人际信任也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为了初步验证这一猜想,本研究先从宏观层面,以大样本调查为数据基础,对南北方的人际信任差异进行探索。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2018 年中国大陆调查数据。调查执行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研究总体界定为居住在中国 31 个省区市(受限于数据来源,不包

括香港、澳门、台湾)内的、并在抽样区县居住 6 个月以上的 18 到 70 岁的成年人。样本采用“GPS/GIS 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以单元格内人口数为规模度量,按照多阶段的抽样方式进行选取。

1. 自变量

本研究以“地区来源”作为自变量,划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水平。南北的划分参照前人的划分标准,北方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山西、青海、新疆、宁夏、陕西、甘肃、河南;南方地区主要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广西、云南、浙江、湖南、上海、重庆、江西、贵州、四川、湖北。^⑥总共纳入分析样本 2035 人,各省份人员数量按照人口基数等比例选取,平均年龄 42.65 ± 14.16 (周岁),男性占比 50.1%,样本地区分布如表 1 所示,最高教育程度、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描述性统计见下页图 1,其中每个变量均为等级变量,1 表示最小(低),10 表示最大(高)。

表 1 WVS 中国地区样本来源描述统计

北方地区	N	占比(%)	南方地区	N	占比(%)
河南	296	14.5	广东	161	7.9
山东	265	13.0	四川	120	5.9
陕西	114	5.6	广西	114	5.6
甘肃	64	3.2	湖北	98	4.8
黑龙江	56	2.7	浙江	71	3.5
宁夏	54	2.7	湖南	57	2.8
吉林	53	2.6	福建	53	2.6
河北	51	2.5	贵州	50	2.5
内蒙古	41	2.0	云南	44	2.1
山西	34	1.7	海南	42	2.1
天津	28	1.4	重庆	32	1.6
青海	27	1.3	江西	30	1.5
辽宁	27	1.3	上海	30	1.5
北京	24	1.2			
北方合计	1134	55.7%	南方合计	901	44.3%

注:按各省份纳入人数降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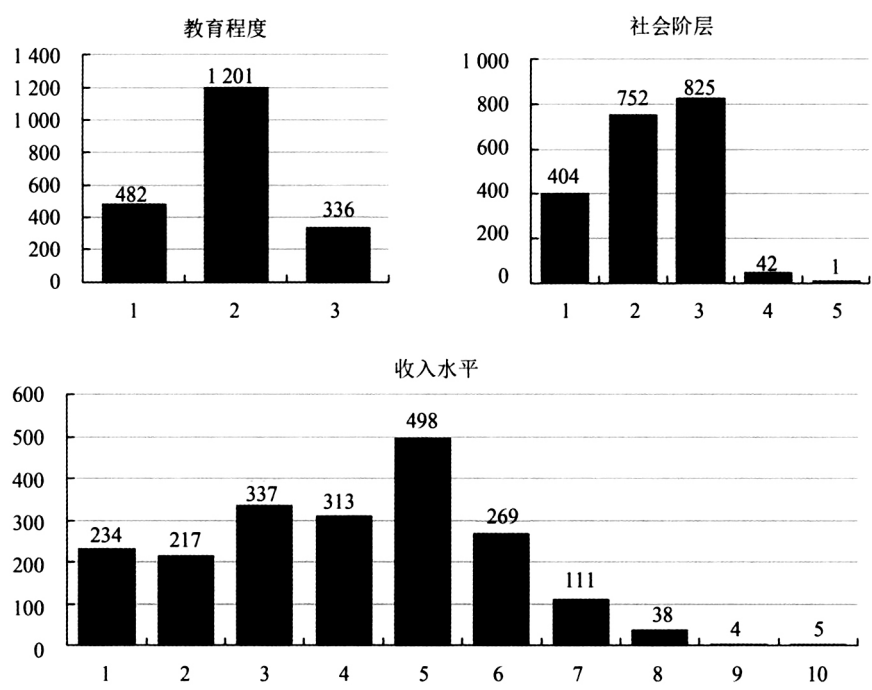


图1 被试最高教育程度、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分布情况

2. 因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问卷中与人际信任测量相关的2项条目,具体为测量被试对“认识的人(熟人)”和“第一次见面的人(陌生人)”的信任态度,1—4等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信任,4代表完全信任。这种处理方法与前人研究一致,尽管缺少多维度的量化,但所测得的信任与其他信任测量指标相关显著,能够代表个体的信任水平。^[10]

(二) 数据分析

为检验南北方对不同对象的信任差异,本研究以南、北方为分组变量,对信任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对“陌生人”的信任,南方人(M = 2.03,SD = 0.61,M代表平均值,SD代表标准差)显著高于北方人(M = 1.94,SD = 0.56),t = 3.25,P < 0.001,Cohen's d = 0.12;对“熟人”的信任,南方人(M = 3.01,SD = 0.48)与北方人(M = 3.02,SD = 0.56)不存在差异,t = -0.74,p = 0.458,Cohen's d = -0.02。

为排除额外变量的混淆,本研究先以对陌生人的信任为因变量,采用分层回归的方式,建立了两

个回归模型(见表2),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社会阶层以及收入水平后,地区来源(南、北)仍能显著预测对陌生人的信任, $\beta = 0.05, p < 0.05$ 。两模型相比, R^2 增加了0.02,且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表明地区来源(南、北)是陌生人信任的可靠预测变量。接着,以对熟人的信任为因变量,重复上述步骤,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上述

表2 对陌生人信任的回归分析(N = 2 035)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β	t	β	t
性别 ^a	0.04	1.81	0.04	1.74
年龄	0.09	3.38**	0.09	3.41**
教育程度	0.05	1.77	0.04	1.66
社会阶层	0.07	2.42*	0.06	2.25*
收入水平	0.15	5.24***	0.14	4.81**
地区来源 ^b			0.05	2.02*
F	8.48***		7.76***	
R ²	0.21		0.23	

注:a. 性别采用虚拟编码,男为1,女为0;b. 地区来源采用虚拟编码,南为1,北为0;*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表中数据均为标准化数据。

变量后,地区来源(南、北)无法显著预测对熟人的信任, $\beta = 0.01, p = 0.641$ 。

以上结果共同表明:(1)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南北之间存在差异,南方人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北方人。集体主义文化的特点在于更加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体往往会通过贬损外群体的方式凸显对内群体成员的偏爱,并以此维护自己所属集体的利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战略的变化,我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目前南方的经济水平更高,南方的气候条件也更加适宜,所以相较于北方,南方地区的集体主义水平可能相对较低,由此导致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更高。(2)对于熟人的信任,南北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因为尽管我国南北方之间存在细微差异,但都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下,所以无论南北,对待熟人的特殊信任都处于较高水平。

局限于现有数据,研究一仅从宏观层面对熟人和陌生人信任的南北差异进行了初步分析,虽然研究一发现了人际信任的南北差异,但文化本身的差异并未直接测量,这将在研究二中进行补充。以往的研究多以“关系”为内外群体作为划分基础,将熟人纳入内群体,将陌生人纳入外群体。为了从多方面验证内群体偏好的存在,本研究参照前人的研究,拓展以地缘为基础的内外群体划分方式^⑧,增加了对“南方人”“北方人”群体的信任测量。根据前文所述,跨区域经历本身可能是对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因此,在研究二中,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研究二的目的有二:(1)进一步分析信任的南北差异;(2)探讨跨区域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研究从我国南、北方的若干高校中选取大学生被试,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大学生群体的流动性较高,并且去外地上大学是很多学生第一次的跨区域经历,能够有效避免多次不同跨区域经历的混淆;其次,同一年级的大学生跨区域经历的时长基本相同,可以有效地实现对时间长度这

一变量的操作与控制,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最后,大学生群体多为18—22岁,处于成年早期,很多观念尚处在发展阶段,因此其信任变化更易观察。

研究二:跨区域经历对信任的影响

(一)被试

从福建和陕西的两所高校中招募大学一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线上问卷,测量时间为2020年12月,最终共收集问卷数据373份。根据问卷填写时间、测谎题剔除无效数据36个,并剔除47个曾经有过搬迁经历的样本,最后将主客观地区来源不一致的3例数据剔除,剩余有效数据287份,平均年龄 18.24 ± 0.69 (周岁)。详细信息见表3。

表3 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N=287)

变量		N	占比(%)
性别	男	121	42.2
	女	166	57.8
生源地	城镇	163	56.8
	农村	124	43.2
地区来源	南方	127	44.3
	北方	160	55.7
跨区域经历	有	146	50.9
	无	141	49.1

(二)研究工具

1. 自变量

地区来源(南、北)。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主观采取“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南/北方人’”1—7级评分;客观上询问被试来源地,参照前人的南北方划分标准。在本研究中,剔除了主客观不一致的被试。

跨区域经历(有、无)。本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被试当前所在地(南方、北方)与来源地(南方、北方),如果二者一致则编码为0,代表无跨区域生活经历,否则编码为1,代表有跨区域经历。以往研究表明:跨区域经历的时间长短、早期是否有跨文化经历可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中,采用

同一年级的大学生被试对跨文化经历时间这一变量进行控制,同时为了避免早期经验混淆,在筛选被试过程中剔除了上大学前有长期(大于半年)跨区域生活经历的被试。

2. 因变量

人际信任。信任的测量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信任测量,1—7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信任,7代表完全信任。为方便表述,根据信任对象与被试自身的群体类别,将北方人对北方人(或南方人对南方人)的信任描述为“同地区信任”;南方人对北方人(或北方人对南方人)的信任描述为“异地区信任”。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倾向。采用 Triandis 和 Gelfand^⑩编制的横纵向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测量被试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共计 16 个项目,共有两个维度,各维度 8 个项目。采用 7 点评分,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在个体主义上的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个体主义倾向越强,在集体主义上的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集体主义倾向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为 0.77。

3. 控制变量

风险态度。已有研究表明:在信任决策过程中,风险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此研究中作为控制变量。采用 Wang 等人^⑪结合几个特定领域的风险态度量表编制出的风险承担评估量表,选择其中测量自然/身体风险、道德风险、经济风险、合作与竞争风险 4 个领域风险态度的题项,共计 16 个项目。采用 5 点评分,从 1“非常不可能”到 5“非常可能”,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对在该领域的风险态度越积极。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为 0.71。除此之外,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将对可能造成信任影响的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人格因素(宜人性、外向性、开放性)进行控制。

(三) 数据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是同一时间面向同一批被试收集,参照前人的做法,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本研究的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⑫共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10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13.53% (小于 3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描述统计结果

对测量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详情见表 4。

3. 南北差异检验

为了弥补研究一中未对跨区域经历进行控制的不足,研究二中,仅以未经历跨南北的被试($N = 141$)进行了差异分析。具体而言,以地区来源为分类变量,对信任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水平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信任方面,北方人对北方人的信任($M = 4.18, SD = 0.52$)显著高于南方人对南方人的信任($M = 3.88, SD = 0.82$), $t = -2.53, p < 0.01$, Cohen's $d = 0.44$ 。在个体主义文化水平方面,南方人($M = 38.64, SD = 5.81$)得分高于北方人($M = 36.82, SD = 5.55$),边缘显著 $t = 1.925, p = 0.056$, Cohen's $d = 0.32$ 。此结果与研究一中 WVS 数据结果一致,进一步补充说明了南方人的个体主义水平更高,北方人的内群体偏好更强。

4. 跨区域经历的影响

首先,以地区来源和是否有跨区域经历为自变量,以对陌生人的信任为因变量,以性别、风险态度、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宜人性、外向性、

表 4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同地区信任	异地区信任	陌生人信任	风险态度
M	37.52	40.77	4.17	4.01	3.02	43.46
SD	5.65	5.41	0.70	0.65	1.11	6.38

开放性为协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地区来源与是否有跨区域经历的主效应都不显著,交互作用显著, $F(287,1) = 6.87, p < 0.01$, 偏 $\eta^2 = 0.03$ 。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跨区域经历对陌生人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了南北差异。具体而言,对于南方人,有跨区域经历的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跨区域经历的个体;对于北方人,结论则恰恰相反,有跨区域经历的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更高(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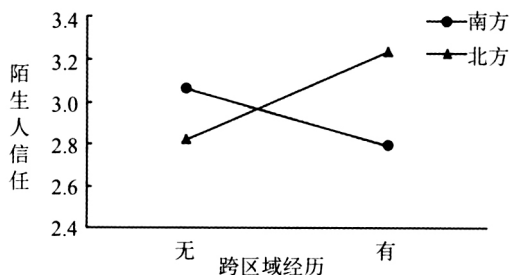


图2 地区来源与跨区域经历对陌生人信任的影响

其次,以地区来源和是否有跨区域经历为自变量,重复上述分析步骤。结果表明:地区来源主效应显著, $F(287,1) = 9.767, p < 0.01$, 偏 $\eta^2 = 0.03$, 北方人对同地区来源的个体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南方人;跨区域经历主效应显著, $F(287,1) = 5.99, p < 0.05$, 偏 $\eta^2 = 0.02$, 有跨区域经历的个体对同地区来源的个体信任水平显著高于无跨区域经历个体,表现出类似“他乡遇故知”的效应;地区来源和跨区域经历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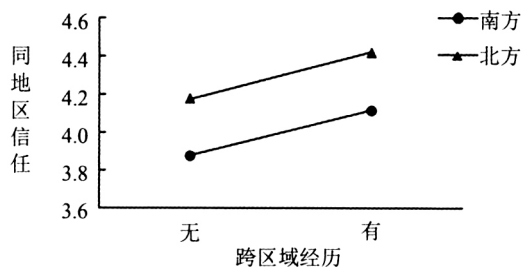


图3 地区来源与跨区域经历对同地区信任的影响

最后,以地区来源和是否有跨区域经历为自变量,以对异地区来源的信任为因变量,以性别、风险态度为协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地

区来源和跨区域经历的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四、总结与讨论

(一) 中国南北方的信任差异

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共同说明了中国南北方的信任差异,并指出可能是由于南北方个体主义文化水平不同引起的。相较于北方,南方的个体主义文化水平更高,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也较高;而北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水平更高,表现出更高的“内群体偏爱”。这为“气候-经济”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但本研究结论与马欣然等研究者的结论截然相反,他们通过“亲亲性”的内隐任务范式对南北方的集体主义水平进行了测量,并得出“南方人的集体主义水平更高”的结论。^② 本研究认为,将“亲亲性”(即奖励诚实朋友的数值减去惩罚不诚实朋友的数值)作为集体主义水平的高低评判依据存在争议。已有研究发现了“黑山羊效应”,即对内群体成员有更苛刻的要求。因此,可能越是信任的朋友,其不诚实行为会激发更大的背叛感,故而选择加大惩罚力度的情况。北方人的“亲亲性”指数较低,可能正是因为对朋友的初始信任较高才导致的,并不足以得出北方人集体主义文化水平低的推论。本研究是通过现有的量表工具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水平进行测量,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并且我们对信任的测量也支持了文化差异的推论,即个体主义水平越高,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越高;集体主义水平越高,内群体偏好更明显。

(二) 跨区域经历对信任的影响

1. 陌生人信任

本研究系统探索了跨区域经历对陌生人、同地区、异地区成员信任的影响。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南方人和北方人跨区域前后的变化趋势出现了差异,南方人到北方(对陌生人信任较低)之后,对陌生人的信任降低,而北方人到南方(对陌生人信任

较高)之后,对陌生人的信任增加,整体呈现“入乡随俗”的趋势。对此,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解释:南方人到北方后,可能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线索,评估北方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在与自我进行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南北之间的差异。根据群体的从众效应,当个体与周围环境不一致时,往往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因此,个体可能出于减少压力、更好适应的目的,把自己对陌生人的信任态度,与其体会到的当前所在地的整体水平进行匹配。

2. 同地区信任

对于同一地区来源的成员,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有跨区域经历的个体对“老乡”的信任显著高于无跨区域经历的个体。这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十分相符,古人就将“他乡遇故知”作为人生四大快意之一。对此,也可以从社会认同理论角度进行解释,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自然地群体身份进行划分,把自己所属的划分为“内群体”,而把自己不属于的划分为“外群体”,并会通过认同内群体成员来减少不确定感以及获得更高的自尊,由此产生了内群体偏爱。^②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从动态角度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提出社会类别是基于情境产生的,不同的情景会激发不同的群体身份。^③相较于没有跨区域经历的个体,当南(北)方人来到北(南)方后,身处北(南)方这一社会情景下,个体对自己南(北)方人的群体身份的激活水平更高,因此,身处异地时对于同地区来源的成员信任水平自然更高。

3. 异地区信任

对于不同地区来源的信任,有无跨区域经历对不同地区来源个体的信任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Allport 于 1954 年提出的群际接触假说认为,在适当条件下的群际接触能够显著改善群际关系^④,这一猜想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并被证明可以提高对外群体的信任^⑤。这可能

是因为本研究中采用的被试是大一新生,数据收集时他们在新环境的适应期在 3 个月左右,根据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部分被试可能正处于适应不良的阶段。群际接触的研究还表明:只有积极的群际接触才会导致更高的外群体信任,消极接触不会提高,甚至会降低外群体信任。^⑥因此,没有出现预期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被试中同时存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最终导致结果呈现折中的趋势。

(三)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局限:(1)限于现实条件,本研究采用横断的对比研究,所得结论虽有一定参考意义,但难以进行因果推论。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设计纵向追踪实验,对跨南北经历前后个体的人际信任的变化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2)本研究只对信任态度进行了验证,得出的结论不足以拓展至信任行为,未来的研究可在行为层面对该研究的结论进行进一步验证。(3)信任态度的影响因素众多,虽然在本研究中已经尽可能对个体层面的变量进行了控制,但无法排除气候、经济等宏观因素的影响。(4)本研究中未发现跨南北的经历会对以南北为划分的外群体信任产生影响,可能是经历的效价(积极或消极)或者适应情况不同导致的,后续的研究可就此展开深入探讨。

注释:

①白丽英、李梓英:《人际信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②Georgas J., Berry J. W., "An ecocultural taxonomy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ross-Cultural Research, vol. 29, no. 2(1995), pp. 121-157.

③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2 期;张建新、Michael H. B.:《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跨文化比较及其认知模型》,《心理学报》1993 年第 2 期;Igarashi T., Kashima Y., Kashima E. S., "Cul-

ture, trust, and social network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 no. 1 (2008), pp. 88 – 101.

④Tahel T. , Zhang X. , Oishi S. , et al. , " Large – 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 , *Science*, vol. 344, no. 6184 (2014) , pp. 603 – 608.

⑤赵娜、周明洁、陈爽,等:《信任的跨文化差异研究:视角与方法》,《心理科学》2014年第4期。

⑥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沈毅:《儒法传统与“特殊信任”的指向——兼论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分类与区隔》,《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⑦Welch M. R. , Rivera R. E. , Conway B. P. , et al. , "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trust " ,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75, no. 4 (2005) , pp. 453 – 473.

⑧Hamamura T. , " Are cultures becoming individualistic? A cross – temporal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6, no. 1 (2012) , pp. 3 – 24.

⑨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新、Michael H. B. :《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跨文化比较及其认知模型》,《心理学报》1993年第2期;Igarashi T. , Kashima Y. , Kashima E. S. , " Culture, trust, and social networks " ,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 no. 1 (2008) , pp. 88 – 101.

⑩Tahel T. , Zhang X. , Oishi S. , et al. , " Large – 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 , *Science*, vol. 344, no. 6184 (2014) , pp. 603 – 608.

⑪Van de Vliert E. , Yang H. , Wang Y. , et al. , " Climato – 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 ,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vol. 44, no. 4 (2013) , pp. 589 – 605.

⑫朱滢:《检验“水稻理论”》,《心理科学》2014年第5期。

⑬汪凤炎:《对水稻理论的质疑: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心理学报》2018年第5期。

⑭Dinesen P. T. , " Where you come from or where you live? Examining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generalized trust using migration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 ,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9, no. 1 (2013) , pp. 114 – 128.

⑮段成荣、吕利丹、王涵,等:《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再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人口研究》2020年第1期。

⑯张剑、柳小妮、谭忠厚,等:《基于GIS的中国南北地理气候分界带模拟》,《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⑰Johnson N. D. , Mislin A. , "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trust question? " *Economics Letters*, vol. 116, no. 2 (2012) , pp. 210 – 212.

⑱陈雅梅、张艺瑶、杨柯,等:《中国南北方信任差异及其心理机制:社会距离的影响》,《第二十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上),2021年,第714 – 715页。

⑲Triandis H. C. , Gelfand M. J. , " Converging measurement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4, no. 1 (1998) , pp. 118 – 128.

⑳Wang X. T. , Zheng Rui, Xuan Yan – Hua, Chen Jie, Li Shu, " Not all risks are created equal: A twin study and meta – analyses of risk taking across seven domains "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5, no. 11 (2016) , pp. 1548 – 1560.

㉑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6期。

㉒马欣然、任孝鹏、徐江:《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南北方差异及其文化动力》,《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0期。

㉓Tajfel H. , Turner J. C. , "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 ,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Psychology Press, 2004, pp. 276 – 293.

㉔Everett J. A. , Faber N. S. , Crockett M. , "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in ingroup favoritism " ,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no. 9 (2015) , p. 15.

㉕Allport G. W. , Clark K. , Pettigrew T. , "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 ,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52, no. 3 (1954).

㉖Tam T. , Hewstone M. , Kenworthy J. , et al. , " Intergroup trust in northern Ireland "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5, no. 1 (2009) , pp. 45 – 59.

㉗Barlow F. K. , Paolini S. , Pedersen A. , et al. , " The contact caveat: Negative contact predicts increased prejudice more than positive contact predicts reduced prejudice "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8, no. 12 (2012) , pp. 1629 – 1643.